

宋代湖南诗僧地域、宗派分布与存诗类型分析^{*1}

彭敏

（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四川成都 61006）

【摘要】 通过数量统计与分析，可以从籍贯、寓寺、宗派、存诗等方面描述宋代湖南诗僧的基本态势。就地域分布而言，宋代湖南诗僧中寓湘诗僧远多于湘籍诗僧，且大多集中寓寺于潭州的长沙与衡山，籍贯与寓寺分布都极不平衡；在宗派方面，几乎所有可考诗僧皆为禅僧，且绝大多数属于临济宗；在诗歌类型方面，所存诗歌以佛门偈颂为主，真正的“文人诗”很有限，推衍至全宋，表明宋代诗僧虽有“士大夫化”倾向，但总体来说仍不离僧徒本位。

【关键词】 宋代湖南；诗僧；籍贯；禅宗；偈颂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1763 （2016）03 — 0115 — 06

湖南一地经过自东晋至唐五代数百年的佛教发展，到宋代已成为全国的弘法重镇。宋代湖南寺庙、僧人众多，并且大量僧人远道而来，长期寓居湖南习法、弘法。这些僧人当中颇有善诗文者。对宋代湖南诗僧的各项基本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勾画其概貌，并能以此为基础对全宋诗僧情况作一些合理的推论。在论述之前，有几个问题需要交待：一是统计地域范围之“湖南”是指今湖南所统之大概区域，但又与之相区别，主要包括宋代荆湖南路的潭州、衡州、道州、永州、郴州、邵州、桂阳监、武岗军与荆湖北路的澧州、鼎州、岳州、靖州、沅州及辰州；二是“湖南诗僧”，包括湖南籍的诗僧与长期寓居湘土或曾游方至湖南而留下诗歌的外地诗僧；三是诗僧统计以《全宋诗》^[1]收录的宋代湖南诗僧为基础，同时参以《全宋诗（订补）》^[2]、《宋代禅僧诗辑考》^[3]及《沅湘看旧集》^[4]等相关文献；四是在具体统计中将宋代分为北宋与南宋，其中《全宋诗》按诗人主要生活时代以第1至第25册所录为北宋诗人，以第26册至第72册所录为南宋诗人，《全宋诗（订补）》和《宋代禅僧诗辑考》、《沅湘看旧集》等所录之湖南诗僧以其主要生活时代分别归于两宋。此外，还需指出的是，因为文学作品的艺术特性，其评价标准是多维的，有时数量的多寡不一定能反映文学水平的高低，但是数据却可以为描绘文学全貌提供一个参考维度，这是将数据统计引入文学研究以立论的基础。

一 两宋湖南诗僧籍贯分布

经统计，可考两宋湖南诗僧共计134人，其中《全宋诗》载100人，《全宋诗（订补）》增补5人，《宋代禅僧诗辑考》增补20人，《沅湘看旧集》增补9人。通过查询以上各典籍中的宋代湖南诗僧小传，对诗僧占籍进行考察，可得以下三个简表：

¹ [收稿日期] 2015 — 06 — 30

[作者简介] 彭敏（1987 —），女，湖南衡山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表 1 两宋湖南诗僧籍贯表

	北宋	南宋	合计
明确为湘籍诗僧	12	9	21
明确非湘籍诗僧	33	29	62
不确定籍贯诗僧	36	15	51
合计	81	53	134

表 2 两宋湘籍诗僧籍贯地域分布表

	潭州	永州	衡州	鼎州	邵州	澧州	不详
北宋	4	1	2	1	1	1	2
南宋	4	3	0	1	0	0	1
合计	8	4	2	2	1	1	3

表 3 两宋非湘籍湖南诗僧籍贯地域分布表

	四川	江西	福建	浙江	江苏	重庆	湖北	安徽	广东	广西	甘肃
北宋	5	8	6	3	2	0	2	2	2	2	1
南宋	9	4	4	3	3	3	2	1	0	1	0
合计	14	12	9	6	5	3	4	3	2	3	1

根据以上三表，可作出以下论述：

第一，从表 1 和表 3 的诗僧来源来看，非湘籍湖南诗僧 62 人，占比 46%，来自全国各地 11 个不同省区，可见宋代的湖南已具备了相当的佛教向心力，能吸引大量外地诗僧到来，是一个全国性的佛教弘法重地。离开本籍寓居外地对于僧人来说其实是相当普遍的，首先在于佛门历来便有云游问道的传统，其次因为僧人身份的特殊性，其认同性与归属感在于佛门宗派，而非俗世本籍，乡土的观念对于僧侣来说是比较淡漠的。正如长期寓居湖湘的惠洪诗云：“已是浮云生世，更余一钵生涯。是处青山可老，何妨乘兴为家。”^{〔1〕}以浮云自比，青山在处即可为家，虽是对自身坎坷命运之慨叹，却也是一般僧徒四处游走的常态。而湖南历史上的名僧南岳怀让、药山惟俨、沩山灵佑、德山宣鉴、石霜庆诸等，皆非湘人，也可作为湘中僧侣异地住寺的情况稍作说明。

相对而言，明确为湖南本土籍贯的诗僧甚少，仅 21 人，约占寓湘诗人的三分之一，这还包括长期寓居别地的湘籍诗僧在内。据高慎涛的《北宋诗僧研究》^{〔5〕}统计的北宋诗僧与李舜臣、欧阳江琳《元代诗僧的地域分布、宗派构成及其对僧诗创作之影响》^{〔6〕}统计的南宋诗僧的数据结果，两宋共有诗僧 508 人，湖南作为一个佛教大省，本土诗僧占比仅 4%，这种情况可谓十

分反常，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湖南文化水平在宋代虽较前代有所发展，但在全国来看，仍然比较落后，知识之士也相对要少。肖华忠从不同的维度来考察一个地域的人才发展状况，指出宋代湖南的各项指标均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之下，而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之上的地域有黄河下游、四川盆地以及江南东部的苏、浙、赣、闽诸地，^[7]与四川、江西、福建、浙江、江苏这些来湘诗僧数量较多的省份基本相符。也就是说因为宋代湖南本土整体文化发展仍然有限，僧人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故而能作诗者甚少。其二是宋代尤其是南宋湘学勃兴，长沙与衡山两大佛教名域恰恰又是书院盛行之地，虽然学者亦与僧人交往，但理学的倡行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本土士人对佛教的信奉。南宋理学家魏了翁为湘中学者所作《敷文阁直学士赠通议大夫吴公行状》载：“夏六月甲子，太中公卒，执丧一循古制，不用浮屠。瑜月，葬东郭门外，湘中士大夫丧礼默浮屠自公始。”^[8]谓当时湘中士大夫以吴猎为首，丧礼采用中国传统的古制，而不用当时流行的佛家形式，可见在禅风盛行的宋代，湘中士人对佛教比较例外地保持着一种戒备心理。

第二，从表 1 两宋诗僧总人数来看，南宋湖南诗僧数量比北宋有所减少，这与湖南在南宋时期湘学勃兴、书院繁荣不无关系。据邓洪波《湖南书院史稿》^[9]，可知北宋湖南书院仅十余所，而南宋则多达五十余所，又考各书院之来历，知南宋不少书院是由北宋的寺庙改建而成，则知南北宋学术与佛禅二者之间彼消此长的关系。

第三，表 1 还反映出两宋籍贯不可考之诗僧人数较多，总数超过两宋湖南诗僧总数的 30 % 尤其是北宋，籍贯不可考者多达 36 人。这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两宋之交时局动荡、战火频仍，北宋资料流传下来的更少，但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诗僧相关资料的不被重视。

第四，从表 2 看，湘籍湖南诗僧主要分布在湘水流域的潭州、永州、衡州和沅水下游的鼎州，而资水上游的邵州与澄水流域的澄州各只有 1 位诗僧，岳州、郴州、武岗军、桂阳监及较偏远的沅州、靖州、辰州等地则没有诗僧出现，可见湖南本土诗僧之籍贯分布与宋代湖南文化发展分布格局是基本一致的。张伟然《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在论述湖南文化发展的格局时作如下总结：“湘水流域出人最早，且一直最为密集，其中五代以前多集中于上游，宋代以后向中下游逆转。其次是沅水流域，资、澄二流域出人较晚且人物稀少。”^[10]可为这种情况略作说明。

第五，从表 3 非湘籍诗僧籍贯来看，寓居湖南的诗僧几乎皆来自南方省份（淮河以南）。其主要原因在于从宋代“擅渊之盟”后政治文化中心迅速南移，如上文所论，川、赣、闽、浙、苏等省份在宋代乃重要的人才集中地，其文化发展程度在全国处于上等之列。虽然淮河以北尚有河南、河北、山东诸省亦属文化发达区，但终因与湖南相隔甚远且佛禅不及南方之盛而未见寓湘诗僧。另外，南北方不同的禅宗观点也影响到诗僧的多寡，神秀所创立的北禅注重宗门的森严戒律与修行的循序渐进，在唐朝因皇室的支持而大盛于京都洛阳；慧能所创之南禅则主张日常修行中的顿悟，相较而言这种禅修方式与国人的理性精神更契合，故而南禅在后来反超北禅，而其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在于形式更为活泼自由，兴之所到即有偈颂，这与诗歌创作的发生很是相似，又南方林泉水石，风景绝胜，亦使僧徒作诗得“江山之助”，因此相对而言，南方诗僧相对于北方有其存在的优势。另外，从表中排名可见寓湘诗僧中以川渝僧人为最，共有 15 人，从地理条件上说这是因为湖南是僧人出川东行所历之第一个重要的佛教道场。而与湖南相临最近的江西却居于第二，则是因为江西除了本身是佛教重省之外，与其临近的福建、浙江等地皆佛禅发达，其僧人大可分布于四方。这个理由同样也适用于福建、浙江、江苏等诸省来湘诗僧人数不比川渝之地。而最南边的两广虽亦与湖南相邻，但终因文化发展水平更低且有五岭阻隔而寓湘诗僧较少。

除以上表格之外，通过与前代对比，湖南诗僧来源情况基本上是对前代的延续，张伟然在《湖南历史地理文化》中对隋唐时期驻锡湖南的高僧进行统计，得出 36 人中除 9 位籍贯不明外，仅 4 人为湘籍，其他 23 人分别来自今福建、江西、陕西、江苏、湖北、广东、山西、浙江、山东、四川、广西诸省，^[10]这些省份除了淮河以北的地区之外，基本上是与宋代湖南诗僧来源地相符的。有意思的是，不仅如此，宋代湘籍诗僧所占的比率亦与隋唐时期湘籍僧人所占比率相近，都是 15 % 左右，可见湖南作为全国性的重要弘法地由来已久，但湖南本籍人从事佛教活动者则相对而言十分有限，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能诗而有名望者相当之少。

而就诗僧总人数而言，据《宋会要辑稿·道释》，北宋天禧五年（1021 年）荆湖两路共有僧尼 22539 人，^{〔11〕} 故而以保守估计，天禧五年一年之间湖南僧尼当不少于万人，而两宋三百年间的湖南诗僧人数却仅百余人，可推知僧人善诗者即便在文化全面鼎盛的宋代亦属极少数。

二 两宋湖南诗僧居湘地域分布

对两宋湖南诗僧的身份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大部分诗僧都曾为寺庙住持，且非本籍住寺的情况十分常见，这种情况值得探讨。此外，因为诗僧的特殊身份，要考察诗僧与地域之间的关系，还有一点需要格外注意，因为僧人一旦进入僧籍，则表示与世俗脱离关系，而僧人不一定是在其占籍所在地剃度为僧，他们不像普通诗人那样对本籍具有较强的归属感与眷恋之心，所以其诗歌创作与本籍的关系不是那么明显，相对而言丛林风尚对其影响更值得关注，因而考察诗僧的寓寺地域很有必要。对两宋湖南诗僧的寓湘身份与行踪进行考察，134 位诗僧的居湘身份基本上都能得到一个相应地判断，其中可考具体寓湘地域者 104 人。所得详细数据可见下表：

表 4 两宋湖南诗僧居湘身份表

	北宋	南宋	合计
曾住持湘中寺庙的居湘诗僧	61	27	88
非住持湘中寺庙的居湘诗僧	10	10	20
参谒游方于湘中的诗僧	5	14	19
住持外地寺庙的湘籍诗僧	4	3	7

表 5 两宋湖南诗僧寓湘寺庙地域分布表

	潭州	鼎州	永州	衡州	澧州	岳州	邵州	郴州	沅州	合计
北宋	52	8	1	3	2	1	1	1	0	69
南宋	19	5	5	2	1	2	0	0	1	35
合计	71	13	6	5	3	3	1	1	1	104

从以上二表可得以下信息：

首先，由表 4 可知，宋代湖南 134 位诗僧中曾住持湘中寺庙者多达 88 位，而 13 位湘籍诗僧中有 7 位出湘住寺，其余的 39 位或寓湘或游湘的诗僧据初步考证至少有 13 位亦曾住持外地寺庙，则宋代湖南诗僧中有 80 % 曾为住持。其原因不难推测：一是住持作为一个寺庙的核心管理者与弘法者，一般文化程度较高，能作诗的可能性较大；二是住持的言行与创作更可能被记载下来得以流传。

其次,从地域来看,诗僧们寓居的寺庙分布极不平衡。从表 5 可见宋代湖南诗僧中可考其居湘行踪者有 104 位,其中有 68 % 集中寓居于潭州,其次是鼎州、永州及衡州,而其他地方则只零星数人。宋代湖南诗僧大量集中于潭州的重要原因是当时湖南的两大参佛胜地长沙与南岳衡山都处于潭州境内。如长沙有谷山寺、道吾寺、云盖寺、伪山密印寺、麓山寺、智度寺、开福寺、三角寺、楚安寺、慧通寺、道林寺、鹿苑寺等,南岳衡山有福严寺、芭蕉庵、石头庵、承天院、云峰寺、法轮寺、方广寺、上封寺、云峰寺、南台寺等,除此之外另有同属潭州的益阳有启宁寺、龙牙寺,浏阳有石霜等,因而僧人大量集中于潭州无足为怪。需要说明的是,在潭州各寺之中,位于现长沙宁乡县的大伪密印寺诗僧最多,先后有 13 位诗僧居于此寺。其次是长沙市内的谷山寺,先后出现了 4 位诗僧。而作为佛教名山的南岳虽然寺庙众多,但诗僧比较分散,每个寺庙仅一至两位。此外,鼎州有诗僧 13 位,分别分布于普安寺、乾明寺、静照庵、文殊寺等,其中德山乾明寺曾寓居 4 位诗僧。其实鼎州诗僧较多亦不奇怪,因为早在东晋时期,鼎州的武陵就与潭州的长沙已出现高僧活动,两地同为湖南最早出现佛教活动的地方,而作为佛教名山之南岳,则直至南朝时期才有高僧人住。历史悠久往往也是僧人的择寺标准之一,故此也有较多诗僧会选择在鼎州寓寺。

三 宋代湖南诗僧宗派分布

僧人一般具有鲜明的宗派系统,类似于文学创作上的师承源流,但僧人的宗门世系远比文学上的派别承续要严格。事实上诗歌宗派的形成对佛门派别体系有所借鉴,最典型的就是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明显受到禅宗宗派世系划分的影响。两宋湖南诗僧在宗派上呈现出极大的不平衡,这种宗派分布的差异或许可为宋代湖南诗僧情状之考察提供一个新的参考角度。通过对《五灯会元》《释氏辑古略》《续传灯录》《五灯严统》《禅灯世谱》等佛家文献的检阅,可统计宋代湖南诗僧宗派分布的具体情形于表 6。

表 6 两宋湖南诗僧宗派分布表

宗派	临济宗			云门宗	曹洞宗	法眼宗	不详	合计
	黄龙派	杨歧派	其他					
北宋	28	10	16	14	4	1	8	81
南宋	4	33	5	1	1	0	9	53
合计	32	43	21	15	5	1	17	134

说明:表中临济宗下的“其他”一项指临济宗未分支时的诗僧和分支不详的诗僧。

从表 6 可知,宋代湖南 134 位诗僧除了 17 位不可考其宗派外,其余 116 位皆为禅僧,占比 86 %。宋代湖南诗僧几乎皆为禅僧的情况并非特例,而是在宋全域中具有普遍性,高慎涛的《北宋诗僧研究》曾统计过北宋所有诗僧的宗派分布,其结果是北宋 300 位诗僧中有 240 位是禅僧,禅僧占了 80 %,川与两宋湖南诗僧中禅宗所占比率比较接近。禅宗诗僧能在诗歌创作中独占鳌头,其原因比较复杂,综合考虑到湖南一隅之特色,或可作以下论述:

首先,自唐末“会昌法难”以来,佛教各宗相继衰微,湖南亦不例外,隋唐时期并行天台宗、律宗、净土宗与禅宗,至宋唯禅宗独盛而已,此乃全国普遍之状况。就湖南具体情况而言,自唐代起,六祖慧能大弟子南岳怀让居于南岳衡山,开创禅宗

南岳系，衍生出伪仰、临济二派，之后临济宗更是兴盛绵延，又分为黄龙、杨歧二支，从此，禅宗便在湖南独占一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湖湘禅宗网络，使得其他宗派更是难以与之分庭。

其次，慧能所创之南禅在发展之初虽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对语言文字持谨慎避免的态度，然而及至宋代南禅却主张对语言文字全面解禁，禅师们创作了大量的“公案”、“机锋”，甚至写下许多大部头的“传灯录”、“语录”等，以供僧徒参详研习，形成了以语言文字为重要传法载体的“文字禅”。这种禅风的盛行要求禅师们具备一定的文化修养，尤其是掌握较好的语言文字组织技巧，否则便无法进行正常的禅学交流。禅僧常常借用诗偈、颂古、赞等文体来表达自己的心性体悟，这些文体的基本特点是句式整齐，句尾有韵，且往往语涉比兴，与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性。宋代禅僧所作偈颂与赞大量地被收入宋诗总集之中，显见禅宗偈颂及赞等诗性的被认可。

其三，诗僧多为禅僧还在于禅僧好与士大夫结交。他们与士大夫经常相互赠答酬唱，探究禅理之余亦切磋诗艺，如道潜、祖可、惠洪等著名禅僧诗人，无一不与士大夫相交甚密。同时，士大夫也大量涌入禅门，据周裕锴《文字禅与宋代诗学》，“士大夫参禅队伍空前庞大”，“士大夫的禅学水平空前提高”，“文化素养较高的士大夫不断将学术气质、文学气贡带进宗门”^[12]，这大幅地提高了禅林整体的诗歌创作水平。宋代士大夫普遍对禅宗持一种欣赏与主动接受的态度，检索《全宋诗》诗人小传，其中以“居士”为号的文人多达 219 位，亦可见宋人雅好禅风之一斑。除此之外，甚至是向来排佛的理学家，亦频繁往来于空门。如南宋湘学代表张拭曾以东道主身份邀朱熹、林用中诸人南上衡山，遍访诸僧，相与酬唱，留下了大量相关诗文，其中多番提到南岳僧老诗集，并对之赞不绝口，足见惺惺之情。

就禅宗内部派别而言，宋代湖南禅僧中又属临济宗诗僧最多，达 96 位，另云门宗诗僧 15 位，曹洞宗 5 位，法眼宗仅 1 位，伪仰宗则不见诗僧记载。临济、伪仰乃南岳下系统，临济宗由临济义玄创立，下传三世后重入湖南，又经潭州石霜楚圆禅师发扬光大，黄龙派在北宋至为兴盛，而杨歧派发展至南宋则反超黄龙派，故而出现黄龙、杨歧二支南北宋湖南诗僧人数情况恰好相反的结果。此外，伪仰宗虽早在唐末便兴起于湖南伪山，但其宗法难传，仅历百余年即落没，因而两宋湖南诗僧中难见伪仰踪影。至于云门、曹洞、法眼三宗，皆是青原下系统，其源地乃江西，湖南虽受辐射，但终究有限，所以诗僧人数相当之少。

四 宋代湖南诗僧存诗类型情况

宋代湖南诗僧存诗数量差异较大，少者仅存诗残句，多者则存诗数十卷；而其存诗内容亦有差别，有全作偈颂者，亦有全作文人诗者，呈现出各异的面貌，具体可见下表：

表 7 宋代湖南诗僧存诗数量表(存诗数单位:首)

存诗数	1	2—10	11—20	21—100	101—200	201—300	301—400	401—500	501—1000	1001 以上
诗僧数	57	40	8	13	5	4	4	1	1	1
诗僧数占比	43%	30%	6%	10%	4%	3%	3%	0.7%	0.7%	0.7%

说明:诗僧仅余残句者为统计方便均作 1 首计。

对于上表数据特征可作如下描述：

其一，从表 7 可知，宋代湖南诗僧作诗数量大多十分有限，仅 1 首诗存世者达 57 人，诗歌数量在 10 首以下者更是多达 97 人，而存诗数量在 10 首以上者仅 16 人。联系前文所论北宋天禧五年湖南僧尼当有万人，而两宋三百年间湖南仅得诗僧百余人，且这百余人之中存诗尚可观者不过十数人而已，可谓凤毛麟角。

其二，如果表 7 说明了宋代湖南诗僧存诗之少，那么表 8 则充分说明了绝大部分宋代湖南诗僧所作诗歌文学性的有限。在论述之前，首先要理清“僧诗”的概念内涵问题，对此古今学界有两种不同看法，一是认为僧诗不包括偈颂，二者有着严格

的区别，如《流奎律髓》《全唐诗》《宋诗纪事》等古籍基本不收偈颂，而收僧人所作文人化的诗歌；二是认为僧人所作偈颂亦为僧诗，如当代诗歌总集《全宋诗》大量收入僧人偈颂。事实上，偈颂在形式上已经完全具备了诗歌的特性，不可因为其内容以传扬教义为主、语言以粗浅质朴为要便否认其诗歌本质，但是偈颂毕竟与文人诗歌有着巨大差别，在具体讨论其文学性时不得不加以区分。宋代湖南诗僧百余人中有 78 位所作诗歌全为佛教偈颂，106 位所作诗歌一半以上为佛教偈颂。而这个数据仍显保守，因为这些诗僧的存诗除了偈颂之外，其实还有大量作品乃赞诗与歌辞，赞诗与歌辞虽非僧人独有创作体裁，但因诗僧所作之赞与歌几乎皆与佛教人物密切相关，故性质仍与偈颂相类，其文学性亦不可与一般意义上的文人诗归于同流。再看文人诗在僧诗中所占比重，134 人之中偈颂数占一半以下的仅 7 人，存诗中不见偈颂者仅 21 人，而且需要指出的是，这 21 人中有 16 人仅存诗 1 首。从以上数据可以明显见出在这些已属鲜有的诗僧之中，擅长作文人诗者更是少之又少，弥足珍贵。

以上数据虽只是从湖南一域统计得来，不过却也透露出全宋诗僧诗歌创作的整体情况，或者说我们可以据此对全宋诗僧的诗歌创作情况作一些推论。首先，关于宋代禅僧士大夫化问题。禅宗由之前的“不立文字”发展到宋代的“不离文字”，让禅僧趋于文人化，而禅门五宗在发展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得到各地官府的支持，禅僧亦努力寻求士大夫与皇室等为“外护”来扩大影响，他们与士大夫一同游历四方，交友结社，吟诗赋词，鼓琴作画，甚至关心国家政事，其行为已与士大夫十分接近，故学界普遍认为宋代是禅僧高度士大夫化的时代，如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直言：“经过唐五代禅宗与士大夫的互相渗透，到宋代，禅僧已经完全士大夫化了。”^[1]山」不过，尽管相较前代而言，宋代禅僧的士大夫化程度更深，但是禅僧基本上还是保持着他们僧侣身份的本色，那种文人化的禅僧其实是极为少数的，而他们所创作的“诗歌”仍以偈颂为主体，整体来看仍与士大夫有着明显的差别。就诗歌内容而言，则以阐说佛理为主。试以住持衡岳芭蕉庵的谷泉禅师的诗为例，释谷泉存“诗”2 首、歌 2 首、偈颂 22 首，这种诗歌体裁的组合形式与比例在宋代湖南诗僧当中比较普遍。

其诗《画壁》：“余此芭蕉庵，幽居堆云处。般般异境未暇数，且看矮松三四树。寒来烧枯杉，饥食大紫芋。而今抛之去，不知谁来住。”^[1]

《落魄歌》：“狂僧性且无拘束，落魄纵横随处宿。有时狂歌歌一场，蓦地起来舞一曲。禅子云，甚奇特，到了依前六十六。阿呵呵，为君述，丰干老汉骑虎出。路逢拾得笑哈哈，却被寒山咄咄咄。”^[3]

《偈颂》：“阿呵呵，忆着我，前年在青州吃个枣。如今立地忽思量，独笑独歌任得倒。张颠李八伯，黄婆郑九嫂。心草草，床头失却大猫儿，走下门前捉蛤蚧。休更讨，南山云引北山云，归去来兮。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朵。”^[3]

对以上三首诗进行比较，《画壁》一首无论是语言、句式、用韵还是意境都相当的圆融，可以称为完全的“文人诗”；《落魄歌》一首句式灵活，语言活泼，虽然充满了俗词的味道，但是表意统一，趣味横生，很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狂放的落魄禅僧形象；《偈颂》一首虽句式基本相对，但语言完全是俗语，句与句之间意义的表达跳脱断裂，给人一种莫名其妙、摸不着头脑的感觉，这当然可能是为了表达禅意的不可着意追寻，但是这种表达方式的确与“文人诗”相去甚远。从以上诗、歌、偈三首来看，因诗体的不同其诗意是递减的，也就是说禅僧诗人的确有士大夫化的成分，但是他们对文人诗与佛门歌辞偈颂其实有着很明确的区别认识，在创作上他们更倾向于创作后者而非前者。再回归到上文所得出来的数据，“文人诗”占僧诗比重相当之少，这其实表明宋代禅僧的创作仍趋向于以宣扬佛门教义为主，其士大夫化的程度可能没有我们所以为的那么深，尽管有少数著名禅僧已完全混融于士大夫之中，但是绝大多数的禅僧其实还是处在其僧侣的本位之上，与士大夫相去甚远。

五 结论

通过对宋代湖南诗僧的地域、宗派、创作类型等数据进行分析，可得以下几条结论：第一，宋代湖南诗僧籍贯分布与寓寺地域分布都极不平衡，这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外地诗僧远多于湘籍诗僧，而湘籍诗僧亦有半数出湘寓居，这与僧人对俗世本籍观念比较淡漠且佛门有云游问道的传统相关；二是外地诗僧集中来自淮河以南各省份，因为宋代的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主要

位于淮河以南，而南宗禅风主张以文传法；三是湘籍诗僧集中来自文化发展程度较高的湘水流域；四是宋代潭州因为有长沙与衡山在境内，是当时湘中寺庙最多的地区，故而诗僧大量集中寓寺于潭州。

第二，宋代湖南诗僧几乎皆为禅僧，其中临济宗又占绝对优势。这一点与宋全域情况基本吻合。具体而言原因在于宋代禅宗独盛，湖南更是南岳禅宗系创立与衍生的温土，南宗禅提倡“文字禅”，临济宗在湖南发扬光大开出黄龙和杨歧两支等等。第三，宋代湖南诗僧中存诗量较多的诗人相当之少，且绝大多数诗僧所存诗歌以偈颂为主。偈颂在文学性的呈现上与士大夫的“文人诗”有着较大的差异，这表明宋代诗僧虽有士大夫化倾向，但绝未脱离僧徒本位，而是仍与士大夫有着明显的区别。总之，通过对宋代湖南诗僧数据的统计可以具化宋代湖南诗僧的基本态势，对这些数据的深入分析可以对照反观宋全域的诗僧整体情况，无论是相同还是相悖的地方都可以为全宋诗僧的研究提供一点参考。

〔参考文献〕

- 〔1〕傅璇琮等. 全宋诗〔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1999.
- 〔2〕陈新，张如安等. 全宋诗订补〔M〕.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
- 〔3〕朱刚，陈珏. 宋代禅僧诗辑考〔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189.
- 〔4〕〔清〕邓显鹤著，欧阳楠点校. 沅湘耆旧集〔M〕. 长沙：岳麓书社，2008.
- 〔5〕高慎涛. 北宋诗僧研究〔D〕.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7：11.
- 〔6〕李舜臣，欧阳江琳元代诗僧的地域分布宗派构成及其对诗僧创作之影响〔J〕.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5）：574—581.
- 〔7〕肖华忠. 宋代人才的地域分布及其规律〔J〕. 西安：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3）：19—44.
- 〔8〕〔宋〕魏了翁. 鹤山集（卷八十九）〔M〕. 四库全书本.
- 〔9〕邓洪波. 湖南书院史稿〔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
- 〔10〕张伟然. 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
- 〔11〕〔清〕徐松. 宋会要辑稿〔M〕. 北京：中华书局，1997.
- 〔12〕周裕锴. 文字禅与宋代诗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 〔13〕葛兆光. 禅宗与中国文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